

文学批评：在众声喧哗中回归理性

□吴义勤

相比于2008年，2009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给人一种众声喧哗的印象，热门的文学话题、文学事件、文学声音层出不穷，长期以来在中国批评界内部诸多被遮蔽和忽略的深层次理论分歧、价值分歧在2009年得到了集中的爆发，这种爆发固然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存在问题，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种标志。大致归纳一下，2009年的文学批评热点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关于新中国文学60年的评价问题

今年是新中国文学60年，如何总结、评价其成败得失自然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焦点。在这方面，张炯的《共和国文学60年的评价问题》（《文艺争鸣》2009.8）、孟繁华的《民族文史：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8）、陈晓明的《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7）是宏观、正面评价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代表性论文，无论是持论的公允和论证的全面都值得肯定。与这种宏观的研究不同，以张霖的《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五十年代初政治与文学的多重博弈》（《文学评论》2009.5）为代表的一批论文则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某些具体问题和现象进行专门的讨论，力求从独特的侧面提供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视角。

不过，在批评界对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进行正面的学术性总结的同时，各种不同的意见也是不断见诸报端。在四川召开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和首都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雷达、孟繁华、贺绍俊等人都发出了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不同判断，不同声音，而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所谓“当前是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期”的观点更是成了引发批评界关于新中国60年文学评价巨大分歧的导火线。孟繁华、贺绍俊、张柠、陈晓明、肖鹰等纷纷著文加入讨论，并在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海外汉学大会上把这种争论白热化了。陈晓明高度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当代作家的经典性，而以肖鹰为代表的 一些批评家则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不认同新中国60年文学的所谓“高度”，认为那不过是“从脚往下看的高度”（肖鹰，《从脚往下看的高度》，《中华读书报》2009.12.9）。

在关于新中国文学评价的这场争论中，吴义勤的《文学性遗忘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文艺报》2009.8.27）一文，作者对当代文学评论中的社会学习习惯以及道德化热情进行了剖析，认为有必要重提“文学性”，在《我们为什么对当代人如此苛刻？》（《文艺争鸣》2009.9）中，作者则对轻视和否定当代文学的深层原因从心理学和观念层面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进行及时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的工作。

《废都》解禁及其他热门作品研究

2009年中国文学评论界最为关注的热门文本当首推贾平凹的《废都》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尤其是《废都》的解禁重版更是成了2009年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废都》研究的众多文章中，李敬泽的《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5）独辟蹊径，以对庄之蝶的精彩分析来切入对《废都》的讨论，立论新颖，思辨独到，令人耳目一新。周燕芬的《贾平凹与近十年当代文学的构成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9.5）试图从学术角度论证贾平凹及其《废

报告文学是一种历史叙事、历史书写。相较于新闻报道而言，它具有滞后性，因为它需要时间距离来全面观察、深入评判和理性思考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已成过去的历史。2009年初南方冰灾一周年至5月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涌现了一大批冰雪报告和地震纪实，形成了“灾难报告”的大爆发。

时间距离给了报告文学作家充足的思考空间。他们在灾难过去后，以多元视角对巨灾开始了再观察、再思考和再书写，尤其注重在人心人性和精神思想层面的开掘与探究。陈启文是带着一个发现的眼光来打量 and 深入这场雪覆重灾的，在《南方冰雪报告》创作过程中，他试图抵达两个现场、两个实际。一是抵达灾难发生的每一个现场，了解灾难的完整过程；一是抵达人心现场，力图洞察灾难中人们的微妙内心。他还进而关注灾难综合症和灾难后遗症，关心灾难对心理和精神的折磨与摧毁，提出了精神重建的严峻课题。朱玉《巨灾对阵中国》对2008年南方冰灾和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的苦难、窘境以及中国应对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描述，并由此延伸，探究巨灾对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的严峻考验与威胁，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积极应对各种灾害的一些重要思路。李鸣生《震中在人心》以图片与文字结合的形式，考察地震对人心的冲击，强调灾后心理和精神重建的迫切性。

报告文学是行动文学。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奔走在大地之上，穿行于民众中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灾区满怀怀着与灾区人民感同身受的深情，一次次地走进灾区 and 灾民中间，用同情、关切和爱护的目光，去搜寻、发现诸多被掩盖和隐藏的真实。向思宇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担任地关注灾区人民灾后家园重建、家庭重建和活着重建，相继推出了《太阳从废墟上升起——汶川地震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纪实》《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两篇重要作品，为读者深入了解灾后灾区实况提供了及时而有力、重要而新颖的材料。

社会问题报告是报告文学的重要样式。朱晓军秉持积极参与生活干预现实的精神，推出两部“救贼”——《一个医生的救赎》深入挖掘陈晓兰打假事迹，继续揭露医疗腐败，描写了一位良医的成长历程和心灵史，呼唤道德和良知，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造假者的救赎》通过一个造假贩假者的自述，告诫那些造假者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继续呼唤公民道德的重建，发人深省。80年代即以《丐帮漂流记》闻名的作家贾鲁生以“病痞了”的笔名，发表《人“妖”之战——中国超级细菌自述》，以超级细菌为叙事者，尖锐批评了中国医疗界滥用抗生素等药品、过度治疗给国人身体健康带来的严重危害。随后又发表《给你败败火——火邪邪与老中医辨正录》，从医学角度批评了中国人不良的生活方式，两

都》的文学史意义，代表了重新赋予《废都》文学史地位的努力。而与此两文不同，孙桂荣的《个性·时代性·文学性——重版之际再话废都》（《南方文坛》2009.6）和严秀英《从方框到省略号——论《废都》再版事件及其他》（《南方文坛》2009.6）则对《废都》的再版持否定的看法。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一部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在众多文章中，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一体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5）是最有分量的一篇，作者对《一句顶一万句》给予高度评价，并通过对“喊丧”的分析揭示了刘震云激进的写作背后隐含的乡土伦理的另类现代性和汉语小说的另类可能性。此外，张颐武的《书写生命和言语中的“中国梦”》（《文艺争鸣》2009.8）、贺绍俊《怀着孤独的自我倾诉》（《文艺争鸣》2009.8）对这部小说的话语风格和精神指向的讨论也较为深入。

除这两部小说外，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河岸》、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风雅颂》、张翎的《金山》、刘醒龙的《天行者》等在2009年度也得到了批评界的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并涌现了一批有深度、有新意的批评论文。这方面，程德培的《方的就是方的——论方方小说的叙事锋芒》（《上海文化》2009.6）、杨小滨的《欲望主体与精神残渣——对〈兄弟〉的心理政治解读》（《上海文化》2009.6）、金理的《荒原跋涉中的自审：论〈风雅颂〉》（《当代作家评论》2009.6）、任相梅的《比红烧肉还要好看》（《南方文坛》2009.4）等等都是富有见地和新意的批评成果。

“五四”学术热再度兴起

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界、批评界对五四运动的讨论与思考也迎来了新的高潮，关于五四的“思想”又进入到了一个更新的层次。

在这方面，刘纳的文章最值得重视。她的《五四能压谁推？》（《社会科学战线》2009.1）逐一反驳了美国汉学家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所提出的诸多观点，发出了中国当代学者富有识见的声音与判断。陈平原的《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4.15）对“五四”的解读也令人信服，他对“五四”的态度代表了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情怀。而张旭东的《“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1）则超越“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主流“五四”研究话语的局限，从现代性的角度对“五四”进行了反思性的思考。

与这些宏观性的对“五四”的反思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微观的层面切入对于“五四”的思考，并以对于“五四”的独特发现给我们以思想的惊喜。如刘再复的《“五四”的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现代中文学刊》2009.1）、邵元宝的《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南方文坛》2009.2）、樊星的《从“新启蒙”到“再启蒙”——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文艺争鸣》2009.7）、孙郁的《被分解的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9.4）等等。

“70后”研究逐渐升温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与“60后”作家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被文学史高度认同、“80后”作家作为青春文学的代表被市场高度认同不同，“70后”作家则多少有点沮丧，他们仿佛被人遗忘的一群。这种

报告文学：人文关怀与精神重建

□李朝全

《解放战争》凸显了历史进程中诸多普通人的命运，传承了《史记》的民族风格，被认为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代表。何建明推出长篇报告《我的天堂》，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展开笔墨，为作者家乡苏州市书写了一部改革开放30年史志、陈桂桥、春桃则潜入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小岗村，深入采访当事人与知情者，梳理《小岗村的故事》，挖掘出农村变革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揭示了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与不可逆转，也提出了与改革相伴随的一些现实问题。袁亚平《大国根本》是为宪法立传的一部大书。作者以粗细结合的线条描绘了一部“中国宪法简史”，勾勒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艰难崛起过程中宪法地位的逐步确立、巩固与提升。杨黎光《中山路》聚焦全国数百条与孙中山先生名字有关的道路，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抉择与曲折历程。张胜友《行走的中国》和《古田·1929》两部政论体报告文学，豪情满怀地为时代作歌，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这些政论作品与电视联播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重读、重评、重估当代文学经典成为2009年一大突出现象。于10月创刊的《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开辟专栏，陆续重登《哥德巴赫猜想》等当代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同时配发原刊责编的回忆文章，为当代报告文学史留下了第一手资料。河南文联主办的《时代报告》杂志，重视对经典报告文学的重登和盘点，也是加入报告文学的一支新军。

此外，《中国作家·纪实》年末刊发赵瑜《寻找黛莉》，以几乎失传的巴金先生1936年写给山西青年女子赵黛莉的七封信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寻找和发现这笔文化遗产及其当事人的曲折经过，揭示了巴金丰富的情感世界，填补了巴金及其创作研究的一页空白，杨守松《昆曲之路》则为已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作史，揭示了文化生存其实质便是民族生存和人类生存这个根本之道。

盘点 2009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协办

本版责编：饶 翔

乡土

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内质坚韧而强大的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仍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的写照与价值理念的来源。

韩少功《赶马的老三》（《人民文学》2009年第11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找到了人。这个人，是一个叫老三的农民。在现实之中，“这个人”一直存在着，只是我们的视线，可能想得更远，而每每从他的肩头上滑过去。农民老三身上或许有“落后”或者“愚昧”的可供“启蒙”的种种，但是他的真纯、正直与可爱却正是我们时代值得珍视的品质。这个人，几乎就是中国农民形象的缩影。

刘庆邦《我们的村庄》（《十月》2009年第6期）写了一个叫叶海阳的留守村庄的男壮年，揭示了一个青壮农民何以落入到日常撬锁、偷羊、破坏大棚、干扰旋地、不思上进的“二流子”地步的原因。“叶海阳怎么办？他不是不是到外边躲一躲呢？他要是躲到外边，还能回到他的家乡吗？”这最后的诘问，凝聚了作家深重的忧患。

阎连科《桃园春醺》（《收获》2009年第3期）写四个打工回来的农村小伙子喝酒后商定回家各打老婆一顿，有一人回去没打，其他三人合谋一起，搅和那个爱老婆的人离了婚。小说结束于他们四人在春天的桃园中的一次掷花的“赌博”，那个叶木森的妻老婆的青年胜了，他的愿望是叫大家回家给各自的老婆买件衣裳。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的讲述带有乡村喜剧的性质，然而却也浸透着淡淡的悲情与怅惘。

胡学文的《虬枝引》（《中国作家》2009年第6期）是外出打工农民的回乡故事，乔风回乡不为探亲，而是离婚，他爱上了别的女人，必须回去对媳妇有了个了断。然而当他回到记忆中的家乡，却发现他的妻子与十三户人家的一棵树树不见了。离婚的主题演变成寻乡的主题。

历史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年小说对于历史的回顾与返望，佳作频仍。

林希的《岁月如诗》（《中国作家》2009年第4期）以自己的亲历讲述了南苑大学号称“七大泰斗”的教授的爱国行为，以及孟露、马克、许人呆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地下党领导下，在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与国民党做斗争的事迹。信仰就是信仰，是与工作、工资、待遇、房车、出国等等都无关的选择。信仰的真诚与无私，是我们心中的诗。

杨少衡《昨日的枪声》（《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写解放战争之后的剿匪。它惊心动魄，也不动声色。小说主写曾祖父与爷爷两代人的纠葛，几回交手，均有胜负。较量的结果是在一个月夜揭晓的，两个世上仅存有血缘关系的人不期而遇，两把手枪握在双方手里，同时开火，一个百发百中的山大王对儿子偏了子弹，一个从未能击中过目标的儿子这回恰将子弹射穿了自己生父的胸膛。小说没有止步于这个大义灭亲的故事，而是让爷爷身后也埋在了曾祖父身边的青山上。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对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文学也有不衰的话题。阿成《住房简史》（《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作为《爱情简史》《买车简史》的延续，注释了作家“在虚构成中享受真实带给我们的种种回忆”的写作追求，同时也是新时期社会变化之巨的缩影。南一民从集体宿舍，到有8平米的房屋，到34平米的住房，到100多平方米的私人产权房，其间酸辣苦辛，难以历数。这个从零到一百的变化，有物质，有记忆。冷幽默与暖意交相来变，来路丝丝纠缠，教人分外珍惜。

莫言的《变》（《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切入历史的角度也是绝个人的。小说中直白“我”与1969、1979、2008确切的时间，犹如经历与实录。这种破障方式，跨越了读、写的神秘距离，也使莫言的风格之一变。一切在变，而“我”也由农民变作军人而至作家，时代给了我们机遇，但同时，也从我们身上拿走了许多东西，比如青春，比如亲密，比如单纯。这时光中最无可把握的一点，也使《变》获得了深义。

家族

有人天生适合做小说家，不独才能，还有条件，家族的变迁，时代的起落，经历的曲折，这诸多个“气场”顶着，那滚烫的熔岩终会有一大喷涌而出。无可置疑，叶广岑正是这众多火山中的一个。《大登殿》（《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写母亲。小说有两条线，一条从母亲的洞房花烛夜写起，新娘晚上就闹着回娘家，不为别的，只为要做妻，而不是妾。另一条线，则切入现实，引出一时尚聰慧的姑娘给人做“小”的故事。两条线交叉于一个中间，女性人格与尊严。母亲对自己独立人格的清晰界限和对之绝不妥协的求证，教人肃然起敬。这里有对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人格文化失落的不安。在“历史的旋回碎片”的检拾中，仍有人格的大意在焉。

母亲开蒋，家族叙事一发不可收，《三岔口》（《中国作家》2009年第5期）写父亲，

中篇小说·

已泛平湖思濯锦 更看横翠忆峨眉

□何向阳

《小放牛》（《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5期）由五姐引出旧时的人物张安达，《玉堂春》（《芒种》2009年第11期）由知青时代的中医引出儿时救己一命的老中医。其中的人生选择、心灵自由和身体关切都围绕着时代与人的关系而行，作家且描且绘，且歌且行，在她的前辈人生与自己人生的两个空间中，感悟着人情的丝丝缕缕，体味着人生的五味杂陈，并从中抽取为人的美德与价值。

爱情

方方《琴断口》（《十月》2009年第3期）杨小北与米加珍的爱情随着白水桥的垮塌指向一个终结。米加珍与杨小北结婚，但终是无法推开蒋汉的阴影，同时也无法躲避另一当事人马元凯的谴责，她更不能拒绝来自心中的歉意与忏悔。她虽尽自己全部力量对加之于她身上的外力进行抗拒与反击，但那散开的命运的弹片仍然百发百中，被击中的当然包括杨小北。这两个伤痕累累的恋人之间爱的虹桥悄然坍塌，恰验证了马元凯的玫瑰不及杂草旺盛的理论。方方追问的是杂草的环境、马元凯们的不信。方方信，所以她以写作爱着这两个备受伤害、情怀纯真的人。

李铁《点灯》（《花城》2009年第1期）写赵永春与王晓霞两个发小长大后相爱成婚一同面对生活艰辛的故事。他们都是小人物，面对的事也都是生计如何延续、困难如何克服。小说塑造了一个有责任心、有自尊心、懂得爱的男人。在贫困与疾病交相来袭的岁月，他仍然不忘点亮那一盏旧楼中的路灯，为他人，也为心灵。

迟子建《鬼魅丹青》（《收获》2009年第4期）写卓霞与刘良圃的爱情，蔡雪岚与罗郁的爱情，最后写了卓霞与罗郁的爱情，里面充满了理解、依恋、憧憬和再度结合的可能性。小说结束于一个晚秋的夜晚，做裁缝的卓霞要为罗郁送去遮寒的衣裳。小说用一个杀妻案的调查作为外壳，却引出与杀机和阴谋全然无关的真情和温暖。滕肖澜《倾国倾城》（《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是一个以爱情为外壳却暗藏杀机的故事，两个有机会晋升的男人和围绕他们的各怀心机的四个女人。外人看来的好夫妻，事实却大有出入，双方机关算尽，不过是为了银行中层升高管的谋算，当然最终胜负者彼此心知肚明。爱情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那只手是权力、欲望还是邪恶？！

感慨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南飞雁的《暧昧》（《十月》2009年第5期）中的爱情，也是利害得失、疑云重重——对于爱情的不同书写，往往是五六十年代生人要给出一个答案，一条道路，让玫瑰通行；七八十年代生人却在世相中穿梭，在心象中探索。小说不提供答案，大道的尽头仍是丛生的杂草连成的苍茫。当然这不代表作家的主观，但它恰是爱情在时代中被书写的某种变化的指征。

思想

旅美作家袁勃梅《老康的哲学》（《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以老康对主人公“我”的爱情追求开始，历尽艰辛终成眷属结束，使“我”获得了一个近距离观察“老康”的视点和角度，显微镜下老康的性格与形成的文化成因一览无余。小说对于撒谎、等级、相对主义、大一统教育方式的深层思考以及所带来的小说与论文的创造性结合考验着我们的文学阅读。

徐坤《通天河》（《人民文学》2009年第6期）写京城小老百姓与房地产商斗法的故事，深意却在探求人的迷失，迷失在众人中，迷失在贪欲中，人于这欲的苦苦苦苦漂泊，《通天河》一劫，在水中挣扎的仿佛只来斯基一人，其实他不过是大大小小的我们的替身。肖江虹《百鸟朝凤》（《当代》2009年第2期）讲述一个从父仇四处拜师的子游天鸣“我”与最后成为“我”生命中的信念的喷呐之间的故事。小说的深意在探索乡村的深层转变如何能在物质丰富的同时而使精神不致渐行渐远，这也是我们现代化行进中的大题。

2009年可说是中国小说的丰年，王松的《事迹》、矫健的《圣徒》、李浩的《被噩梦追赶的人》《邮差》《半朗的织女》，东紫的《春茶》、舒春平《鸟人》、陈应松《巨誓》、蒋子丹《风月E时代》、郝炜《种在柏林里的苞米》、陈谦的《望断南飞雁》、须一瓜《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温亚军《地烟》、陈希我《母亲》、肖建国《短火》、阿袁《汤梨的革命》、陈旭红《白莲湖》，晓航《灵魂深处的大象》，邓刚、刘益善、季栋梁、徐岩、徐则臣、南翔、王祥夫、孙方友、林那北、黄味梅、陈晓明、鲁娃、女真、李亚、陈家桥、王大进、鲁敏、墨白、乔叶、郑局廷、王十月、罗伟章、津子围、哲贵、陈集益、王手、王方晨、陈河、吴君、张惠美、颜敏、黑丰、武歆、王棵、李唯、柳岸、吕魁、马小淘等新作，成就了丰年之实。2009年，新一代小说家出现了，滕肖澜、肖江虹、南飞雁，她（她）们立于而立之年的，这就是文学不断前行的节奏，这节奏，既不能生造，也不可更移。文学，正因有这无可争辩的向前节奏，才使艺术的独创性得以在每一时代能够持续，使时代的使命在每一代人身上得以完成。